



帝國與族裔：
英國近代早期戲劇中的
國族主義與身份認同



中山大學出版社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R.O.C.

帝國與族裔：英國近代早期戲劇中的
的國族主義與身份認同

王儀君



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

帝國與族裔

余光中序：對立或是同化？

王儀君教授的這本論著《帝國與族裔》，雖以英國近代戲劇為例，來探討並印證國族主義與身份認同，涉及的問題並不限於英國，更包括歐洲列強在政治、宗教、經濟、軍事各方面與「他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書中所謂「近代早期」大致是指文藝復興時期及其餘波、尾聲，相當於十六與十七世紀。引述的名家包括莎士比亞、馬羅、德萊登；至於其他作家則份量較輕，而像羅利、威爾金斯、阿法兒·班、布蘭德之流，則在詳盡的文學史上都難查到。

第一章的場景設在西方與鄂圖曼帝國之間，地理上更涵蓋北非、中東、中亞。第二章主要引證莎士比亞的名著《威尼斯商人》，探討的主題當然是西方人和猶太人之間的經濟利害與法律鬥智。第三章引證佛萊契爾的《南島公主》，探討的是葡萄牙殖民東印度群島與摩鹿加的恩怨，並涉及兩性與政治的糾葛。第四章引證的劇本都難稱名著，而涉及的地區卻包括波斯、摩洛哥，與北美洲印第安人之離島。第五章專引以印第安人入戲的作品，而以印第安公主波卡虹塔絲嫁給白人並歸化英國改信基督為主題。第六章所引《亨利五世》與《亨利六世》都是莎士比亞著名的歷史劇，主題則是英法兩國王位之爭互見消長的政治勢力，訴之於百年戰爭，而以亨利五世的民族壯志與聖女貞德的烈士精神最為動人。第七章引證的是西班牙歷史，演出的是十五世紀末西班牙二王（Isabella and Ferdinand）收復格拉那達並對入侵與統治數百年的北非摩爾人大舉改籍清教。

綜觀本書共七章，英國戲劇十四種所探討的小而身份大而國族的主題，在時間上縱貫兩個世紀，在空間上卻遍及歐洲、亞洲、非洲、美洲，絕不限於英國，而統治者與受治者之間的關係，究竟是同化或異化，對立或互動，相引或相斥，實在複雜而又微妙。儀君能從中理出井然秩序，實屬難能。

我們也不妨以中國的現實來印證其中的得失。例如香港，以往淪為英國的殖民地，誠然是一負數，但是英國制度建立的法制與自由，對日後台灣海峽兩岸卻不無啟發，而在國共內戰期間，也先後成為「左派」或「右派」避難之地，尤其是提供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繼儒家之絕學。文革十年，對許多人來說，香

港更無異是一個救生圈。

另一例便是滿清統治漢族，反而倒過來改習漢文，不廢科舉。清初還有不少漢人有志反清復明，但是後來標榜基督教的太平天國崛起，挺身出來平定亂局的，反而是心存儒家的漢人如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和胡林翼。甚至到了清末，仍有康梁一輩曾想建立君主立憲政體。其間的正、反、合真是充滿了弔詭。

我自己這一輩在國族的認同上也曾經難以自處。以下且容我引四十年前拙作〈江湖上〉的末段，聊供儀君參考：

一片大陸，算不算你的國？

一個島，算不算你的家？

一眨眼，算不算少年？

一輩子，算不算永遠？

答案啊答案，

在茫茫的風裏。

2011年8月

於中山大學

自序

帝國與族裔、異邦與異邦人作為專書的構思可以追溯到十年前，國科會補助國外移地研究。大雪紛飛的時節，是家人團聚的時候，香檳的圖書館卻成了外籍學生與國際學者最佳的落腳處，來來去去熟識的微笑面孔和當地圖書館員體貼的問候是最窩心的異國經驗。然而，在遙遠的過去，在世界其他角落，相異的族群又是如何相處？異邦與異邦人的定義又是什麼？莎士比亞舞台上的奧賽羅、亨利五世的法國新娘，和橫渡大西洋的探險家又如何自我定位？對照於各個時代文學中游離於社會邊緣的角色和索那拉加(Sornarajah)等社會學者所稱的「內部殖民地」，異邦與異邦人的涵意除了衝突、感傷、悲憤和懷舊之外，還有多重層次的情感與想像。然而，異國想像的元素中，雖然有時摻雜了浪漫的憧憬和難以詮釋的歧視與偏見，迷惘、失落與焦慮卻難掩懷鄉和對於異地的複雜情結。從物質需求與國族主義高漲的大航海時代以降，異邦與異邦人和帝國確實交織成不同的圖像。

世界文學中的帝國有著不同的面貌，地理政治與地圖的繪製隱含著帝國擴張時運用的人力與物力，而文人之筆也不時讚頌、嘲弄或唾棄帝國的形貌。梅林的亞瑟王的王國充滿傳奇的色彩，集數學家、天文學家、占星學家、地理學家於一身的約翰·迪伊(John Dee)則替女王伊莉莎白一世雕塑了十六世紀大英帝國的稱號和藍圖；自此，如脫疆之馬的國族論述和行動主義在人類歷史上衍生了族群不同的際遇。英國戲劇中，帝國與族裔的素材經常取自歷史，那坦利·李(Nathaniel Lee)書寫了不可一世的亞歷山大大帝，佛萊契爾(John Fletcher)則以皮克特族(the Picts, the Icenic)王后的角色對比西元一世紀，羅馬軍隊進駐現今蘇格蘭地區時，當地住民族群的認同問題。十七世紀時，帝國與族裔的主題深受英國觀眾的歡迎，歐洲其他國家的情況亦是如此，西班牙劇作家卡德隆(Pedro Calderón de la Barca)書寫北非和西班牙的衝突(*El Principe Constante*)，法國劇作家皮埃爾·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筆下的席德和匈奴王阿提拉也呈現出歐洲人士對族群的

想像。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有關族群議題的翻譯作品也受到英國讀者的歡迎，英國的路特 (Joseph Rutter) 翻譯了《席德》(*Le Cid*)這部西班牙英雄收服摩爾人爲主題的劇本；席爾(Aaron Hill) 也將伏爾泰(Voltaire)述說凱撒利亞女子與伊斯蘭教的蘇丹相戀的故事(*Zaire*)搬上英國舞台；威爾金(George Wilkins)書寫巴布利在十六世紀的饑荒、瘟疫和內戰。劇作家戴文南(William Davenant, also spelled D'Avenant)，基於國家競爭，不僅書寫帝國的擴張，也在劇本中諷刺西班牙人對秘魯原住民的暴行，而柯曼(George Coleman)的劇本《加來城的降服》(*The Surrender of Calais*)則呈現英王愛德華三世攻打時法蘭西小城村民勇於犧牲，抗拒英軍的故事。從十六世紀末開始，因爲商業發展需求，英國在黎凡特 (Levant)、莫思科維(Moscovy)、印度的蘇拉特(Surat)相繼設置通商地點，位於北非的的黎波里(Tripoli)和美洲的詹姆士城(Jamestown)也成爲十七世紀的文學中經常提到的城市。在文藝復興航海技術開展的同時，歐洲大陸與中亞及亞洲諸國的貿易也藉由陸路開啓了新的紀元。不過，如同米格諾樓 (Walter Mignolo) 所說，在歷史上的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經由交通的改善，加速了權力與政治的擴張與競爭；從十七世紀以降，獲有科技知識的國家，更加入了殖民的競技，所以光輝燦爛的文藝復興時代有著黑暗的面相。這些跨界所涉及的故事有的悲壯、有的慘烈、有的溫馨、有的淒美動人；有的書寫懷鄉憂國之思，讓人唏噓。當然，十七世紀文類中，書寫族裔的旅行誌事也備受英國讀者青睞。威廉·利思高(William Lithgow)以西方的角度觀看十七世紀初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被派至蒙兀爾帝國的湯姆斯·羅(Thomas Roe)和旅行家湯姆斯·寇里亞特(Thomas Coryate)也用帝國之眼審視此一東方帝國的都城與風俗。中研院人文社會研究中心的劉石吉教授認爲，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築城與拆城的歷史；歷史學者曼寧(Patrick Manning)認爲，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遷徙史。然而，不論是城市文明，還是遷徙的歷程，地圖見證了統治者的願望。蔡琰詩中悲泣動亂時代的家國和歷代邊塞詩歌也都流露因跨界產生的紛紛擾擾。世代更替，余光中筆下的智者悄然問秦俑，從長城到交趾的幅員爲何成爲失蹤的帝國，然而，文學中的帝國不只是人類的記憶。誠然，帝國的

興起與隕落卻與族群、國家與身份認同的議題交織成人類流動與跨界的意義。

《帝國與族裔》這本書的寫作長達八年，《地理與疆域》專書也在撰寫中。在這漫長的八年裡，突然驚覺我的三個孩子都已長大；小虎隊紅色蜻蜓的錄音帶已束之高閣，然而這些年來，書房裡的參考資料卻愈堆愈多。我最要感謝國科會和國立中山大學的贊助；國科會的補助讓出國研究成爲可能，中山大學則是學術成長的處所，圖書出版獎勵加快了出版的步調。我感謝余光中老師和師母是我在困頓時的明燈，感謝黃美序老師、滕以魯老師、蘇其康校長、彭鏡禧教授在學術路程中的指引。我也感謝我的先生從實驗室返家時，無意戀棧家中圖書滿溢的書房，得以讓我悠遊於書中帝國的疆域，忖思帝國與族裔的糾葛。衷心感謝我的婆婆徐黃完妹女士，兩次赴美照顧當時一面唸書，又初爲人母的我，這種恩情難以回報。我也心疼我的三個孩子們都能在十六歲前學會煎蛋、炒菜，自己打理一般事物。感謝曾經幫助過我整理資料、打字和校對的助理們，更感謝父親王政先生和母親蔣琪女士對我無條件的愛。

民國一〇〇年一月二十日

於國立中山大學

目 次

余光中 序：對立或是同化？	i
自序	iii
第一章 帝國與族裔：英國近代早期戲劇中的帝國修辭	01
第二章 商業行爲與家國意識：「放貸」與猶太人身分認同	30
第三章 商業、殖民與族裔：佛萊契爾劇本《南島公主》 中的東方殖民與帝國國族記憶	54
第四章 空間、旅行與族裔：《海之旅》、《英格蘭三兄弟之旅》 與《西方佳人》	81
第五章 帝國與美洲原住民女性：《藍特寡婦》和《印第安酋長》 中之殖民論述	105
第六章 征服的慾望：試論莎士比亞《亨利五世》及《亨利六世》第一部 中之帝國主義、國族主義與身分認同	130
第七章 族群與疆域：德萊登的格拉那達與布蘭德的哥多華	161
引用書目	184
索引	208
附錄：論文出處及說明	213

第一章 帝國與族裔：近代早期戲劇中的帝國修辭

格林布萊特 (Stephen Greenblatt) 在其論著《驚奇擁有》(*Marvelous Possessions: The Wonder of the New World*) 中，將《曼德威爾遊記》(*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馬可波羅遊記》(*Travels of Marco Polo*) 和哥倫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的旅行日誌做了相當有趣的比對。根據格林布萊特的說法，哥倫布在第一次航行的時候，很可能帶了他最喜歡的兩本書：《曼德威爾遊記》和《馬可波羅遊記》。¹前者是根據作者想像杜撰的遊記，書中對於許多的國家或者族群的描述純屬子虛烏有；而後者則是根據真實的經歷描寫，記錄了西方人眼中的東方世界。但是，這兩本遊記卻有一些雷同之處；其一，兩本遊記的作者都是根據西方傳統和基督教文化來審視截然不同的族群和世界風貌；其二，兩本書對歐洲人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讓西方文學中異族文化的呈現蔚為風潮。事實上，從曼德威爾、馬可波羅到哥倫布，每一種旅行誌事都強調「親眼目睹」，以證明所記載的人、事、物有極大的可信度。這樣的敘述文字不僅強化敘事者的敘事觀點，並且引導讀者，以週遭的文化背景，對所敘述的事物加以審視與批判。因此，這些遊記中的意符與意指的距離拉近，不僅幫助讀者建構自身文化的主體，而書中所敘述的事物則退居於被型塑的客體，西方主體與其他世界客體遂成爲近代早期文學中不斷出現的敘事模式。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以來，文學作品中異族文化的呈現代表著不同層次的意義。由於航海技術的發達、陸路交通便利、商業和貿易的範圍日益擴大，隨著科學知識的進展和地理空間的認知，歐洲人已經將空間領域的競爭轉移到海上與更遙遠的陸地和島嶼，帝國競爭開始。一五五〇年代的歐洲人已經和非洲西海岸的幾內亞 (Guinea)、加那利群島 (Islas Canarias) 進行頻繁的貿易，葡萄牙人不僅遠訪格林蘭 (Greenland)，並且來到東方的印度、東印度群島、中國和日本。歐洲海上霸權興起的重要里程碑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一四九二年；次年，教宗亞

歷山大六世當時宣佈，將所有新發現的島嶼分給葡萄牙和西班牙，於是巴西成爲葡萄牙的屬地，而菲律賓則歸屬於西班牙(Hampden 14)。相較於西班牙和葡萄牙，十五世紀的英國並未顯示出爭霸海上的潛力，但是在一五九〇年代，英國雪利爵士兄弟 (Shirley brothers; Sir Robert Shirley and Sir Anthony Shirley) 便以使節的身份來到波斯，湯姆斯·羅伊 (Thomas Roe) 也在一六一五年出使蒙兀兒帝國 (Mogul Empire; Mughul Empire)，建立通商關係。事實上，一五五〇年代、一五八一年英國分別與俄羅斯和土耳其建立貿易關係，十七世紀初歐洲各國的貿易延展至印度。近代早期，拓展貿易是英國政府的要務，冒險家錢斯樂 (Richard Chancellor 1521-1556) 出訪的路徑原是經由白海 (the White Sea) 到達中國和日本，但是計劃並未成功(Holroyd 80)。不過，錢斯樂等人的東方之行有著意想不到效果。錢斯樂等人到達俄國時，正是「恐怖伊凡」(Ivan the Terrible) 在位的時候，不過莫斯科維商業公司 (Moscovy Company 1555) 卻在伊凡沙皇的支持之下，迅速地建立起英國和俄國的雙邊貿易關係。² 當時英國往東方拓展的經濟訴求是替英國的羊毛製品尋找一個傾銷的管道，並且以此交換東方的絲織品和香料。莫斯科維公司果然不負英國女王的期望，擔負了貿易的功能。在一五九九年，英國在印度成立東印度公司，而威爾·亞當斯 (Will Adams) 也乘著荷蘭商船，在一六一三年到達日本，東方的特使沙利斯 (John Saris) 更取得日本的許可，在平戶 (Hirado) 設立工廠(Rogers 1-35)。當時，英國與外國貿易最大的困難是與葡萄牙人的競爭，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商船早在英國之前即搶先取得與中國貿易的機會，將中國的瓷器和絲運銷歐洲，英國雖終於在一六七八年在台灣設廠 (Chang 24-32)，但並未維持長久。

英國史上的伊莉莎白時代是一個探索世界的時代，使節們除了帶回商機之外，還帶回異地的珍奇物品，這些珍奇物品中甚至包括來自不同國家的「人類」。舉例來說，霍金斯 (Sir John Hawkins 1532-1595) 從非洲帶回非洲人，是英國最早涉及奴隸販賣的人仕(Ruchames 251)；佛畢夏 (Martin Frobisher) 在探查到東方路線的時候，帶回了愛斯基摩人；美洲原住民公主波卡虹塔絲 (Pocahontas)

被誘拐至詹姆士城，一六一四年嫁給約翰·洛夫（John Rolfe），次年，洛夫將她帶至英國，謁見當時的國王詹姆士一世，也成為詹姆士一世宣揚國威的最佳範例。如同凱倫·紐曼（Karen Newman）所說，在國族主義開展的大航海時代，英國伊莉莎白女王當時想要了解的不僅是英國發展的契機與國家競爭力，她也渴望獲知一些「稀奇的場景」或珍奇異事（spectacle of strangeness）；雖然伊莉莎白女王強調，絕不可以用強迫的手段脅迫這些來自異國的人種，可是她的臣民總是「不負所望」地將非洲的原住民用哄騙或強制的手段帶回（Newman 97）。這些來自異國的人種不僅成為英國人好奇心驅使之下的觀察物，也同時象徵他們邁向殖民異地的里程碑和紀念品。他們在異地的見聞記事和觀察紀錄像是一部部種族紀錄，但是許多敘述者卻掌握了觀察主體的角色，以自身較優越的文化角度，揣測並建構異族人士的行為和文化。

英國對海外權力的擴張與國族主義的建構並駕齊驅，艾爾頓（G. R. Elton）指出，在一五三〇年代，英國議會即宣佈英國是一個由帝王統馭，以國家與教會為基礎的「帝國」（3）。從康登（William Camden）的《不列顛史》（*Britannia*）和海克路亞特（Richard Hakluyt 1552-1616）的《航海之旅》（*Principal Navigations of the English Nation*），以及史賓賽（Edmund Spenser）的《仙后》（*The Faerie Queene*），都可以明顯看出近代早期英格蘭政府及文化人企求政治與文化統一的論述。根據海爾傑森（Richard Helgerson）的分析，國家論述主要建構於以國家為主題的自我書寫（national self-writing），從事國家論述的作者不但用自己的語言寫作，樹立以所謂「英格蘭」為屬性的國家意識型態與疆界（12-16）。這種意識型態將自我的屬性和他者的屬性做了明顯的區分，並將英國在眾多的西方國家與文化中建立獨特的地位。換言之，此時的英國已經具有國家的主體觀，代表了獨立的自我。因此，海爾傑森（Helgerson）評論說，在文藝復興時代的英國，以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為首的劇作家們也建構了「國家劇場」（*theater of a nation*），詮釋以英格蘭為本位的價值觀（195-200）。雖然海爾傑森指出，這樣的國家劇場不僅呈現貴族與統治者的權力，又得以藉著「自我疏離」的模式

(self-estrangement)，呈現與他國文化的差異，再進一步反思自身的文化(195-200)。但是，無法否認的是，近代早期戲劇中的論述，不僅反映出異族文化相會時所產生的族群問題，而且突顯了帝國建構的過程。因為戲劇中異族文化的呈現，一方面反映時代的交替，滿足觀眾對當時其他文化的好奇心；另一方面，藉由異族文化怪異、低俗或野蠻特質的呈現，將戲劇內容轉變為帝王的宣傳機制，並間接達成建構英國文化屬性的訴求。在英國近代早期戲劇中所呈現的異族文化和異族人士不勝枚舉，其中有奸詐的猶太人、殺人如麻的土耳其人、個性魯莽的摩爾人、充滿異國色彩的亞馬遜女人、勇於競爭的羅馬人和來自歐洲、亞洲不同國家的族群和文化。在十七世紀的宮廷舞劇中，更有印第安人和東方武士的呈現。³

近代早期的歐洲人對世界上各種新奇、陌生和外來的人事都感到好奇。當異族文化出現的時候，他們以西方文化的主體認知，企圖教化和馴服這些外國人，或是企圖將「沒有文化」的異國人士同化為基督徒，處於歐洲的英國人也不例外。但是，這些異國人士在英國本土的遭遇卻相當坎坷，他們經常是樊籠裡的囚徒，參觀者只需付若干花費即可觀察或「欣賞」這些遠從異地來的「他者」(Weil 65)。紐曼指出，英國人不僅將遙遠國度的人民視為野蠻和需要教化的異類，他們對於想要征服的鄰近地區，如威爾斯、愛爾蘭和蘇格蘭等，也冠上不雅的封號，並將其語言和風俗習慣視為訕笑的對象(99-100)。紐曼研究的殖民論述特別強調「征服者的語言」，紐曼強調，因為在主權擴張的時候，征服者強勢的語言是權力的表徵。一四九二年，阿維拉(Avila)地區的主教寫信給卡斯提爾(Castile)女王伊莎貝拉(Isabella)的時候曾說：「語言是帝國最佳的工具」(Elliot 125)。的確，在眾多的殖民論述裡，藉用語言來陳述與建構「他者」的劣質屬性是擴張主義者最佳的掩飾與藉口。

值得注意的是，從英國近代早期至十九世紀的舞台上，殖民論述和霸權擴張主題經常以二種模式呈現：其一是以英國文化為主體，將其判定為劣質的異族同化(assimilation)；再者是以異族入侵的模式切入主題，引申政治、地理與族群

之間的傾軋。前一種模式多半出現在文藝復興時代末期的戲劇，如《海之旅》(*The Sea Voyage*)、《英格蘭三兄弟之旅》(*The Travel of the Three English Brothers*)、《聖派翠克在愛爾蘭》(*Saint Patrick for Ireland*)、《亨利五世》(*Henry V*)和班·強生的《黑之宮廷舞劇》(*Masque of Blackness*)等，都是將異族人士視作異己，並以文化或武力將異族同化或馴服的例子。本書的第一章即以英國近代早期的劇作為範圍，就伊莉莎白時期劇本中出現的異族，分為幾個族群討論。因為此一時代的戲劇作品，經常採用異族入侵的模式，呈現族群之間的衝突、文化隔閡和殖民所涉及的疆域問題。本書分析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的十幾部重要劇本、時代背景與種族論述，以及劇本中呈現異族時的政治意涵。第一章的主體是概述，但所分析的劇本以涉及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為主，其中包括克利斯朵夫·馬羅(Christopher Marlowe)的《坦柏林》(*Tamburlaine* 1587-1588，又譯為帖木兒大帝)，皮爾(George Peele)的《阿爾卡薩戰役》(*The Battle of Alcazar* 1588-9)，以及濟德(Thomas Kyd)的《蘇萊曼和珀賽塔》(*Solyman and Perseda* 1590)。第二章的主題是商業行為與家國意識：「放貸」與猶太人身分認同、第三章以商業、殖民與族裔探討佛萊契爾戲劇《南島公主》中的東方殖民與帝國國族記憶、第四章藉由《海之旅》、《英格蘭三兄弟之旅》與《西方佳人》三個劇本，探討空間、旅行與族裔，第五章的重點為帝國與美洲原住民女性為主軸的兩個劇本：《藍特寡婦》和《印第安酋長》，並申論兩部戲劇作品所呈現的殖民論述。第六章討論征服的慾望，並從莎士比亞《亨利五世》及《亨利六世》第一部文本，分析帝國主義、國族主義與身分認同。第七章的重點則為族群與疆域，探討劇作家德萊登筆下的格拉那達城與劇作家布蘭登所描繪的哥多華，並分析劇作家所詮釋的族群與國族認同。

鄂圖曼土耳其人從中世紀末期開始就是歐洲人的夢魘，出現於文學與歷史作品中的土耳其人不勝枚舉。早在一四八二至一四八四年，描述土耳其人攻打羅茲島(Rhodes)的紀錄文學作品，就被翻譯成英文，翻譯者是凱依(John Kaye)，一個自稱是桂冠詩人的英國作家(Forsyth 90)。根據歐洲歷史，西方基督教世界遭受的大劫難除了成吉思汗西征之外，就是在十五世紀中葉，鄂圖曼土耳其人進

軍歐洲的軍事行動。據知，讓歐洲人聽而生畏的鄂圖曼帝國穆罕默德二世 (Mehmed II)，在一四五三年攻陷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後，對歐洲展開一連串的軍事行動，讓歐洲各國心驚膽顫。當時的鄂圖曼土耳其佔領了波士尼亞和赫芝格維那 (Bosnia; Herzegovina)，一四七〇年攻陷威尼斯東邊的古城高昔斯 (Chalcis)，一四八〇年佔領奧特蘭多 (Otranto)，同年土耳其人更用大型火器攻打當時耶路撒冷聖約翰 (St. John) 軍隊駐守的羅茲島。羅茲島雖因穆罕默德二世之死，在恐懼中喘息了四十年之久，但一五二二年，又被蘇萊曼大帝 (Sulaiman the Magnificent) 攻陷。⁴蘇萊曼曾攻陷貝爾格勒、布達佩斯、羅茲島、巴格達、亞丁和阿爾及爾，他的艦隊一度橫行於地中海上，受影響的地區包括北非，以及與歐陸各國相鄰的地中海城市及島嶼，成為歐洲國家的威脅，不少此類的記錄遂被寫成劇本。十七世紀，英國劇作家戴文南的劇本《圍攻羅茲島》(The Siege of Rhodes)，即是以羅茲島戰役為背景的作品。據說，奧地利的斐迪南一世曾經派遣使節德·伯斯貝克 (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 面見蘇萊曼大帝 (de Busbecq 78)，往返信件成為重要歷史資料。事實上，使節、商旅、傳教士以及歐洲各國的帝王都目睹基督教聖城被伊斯蘭教徒佔領的紀錄繁多，而組織十字軍東征的呼聲以及異教徒的行動從十三世紀開始，直到十八世紀才停止。⁵根據黑渥德 (C. J. Heywood) 的研究，一五〇一年到一五五〇年間，歐洲記錄鄂圖曼土耳其的各式文學或具相關記載的作品約有一千多種，到十六世紀後半更增至二千五百多種 (33-55)。這些文字紀錄都足以證明土耳其對歐洲的影響，尤其是，土耳其人在地中海的威名遠播。歐洲國家雖然驚怕土耳其的商業開展，卻也因此竭力推展外交與商業關係。以英國為例，一五八一年，英國在伊斯坦堡的土耳其公司 (Turkey Company) 成立，並且從一五八三年開始，互有商業或使節的往來，英國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終於在摩洛哥蘇丹王使節 (Mulai Ahmad Al-Mansour) 時，達到最高峰。不過，在眾多的文字記載裡，土耳其帝國經常被呈現為負面的形象，伊斯蘭教也被冠上殘忍不馴的名稱。當時關於伊斯蘭教徒最有名的兩本書，一是哈特威爾 (Abraham Hartwell) 所譯的《鄂圖曼帝國》(L'Ottomano 1597)，另一本則

是諾敖斯 (Richard Knolles) 所著的《土耳其通史》(*The Generall Historie of the Turkes* 1603)。十七世紀中葉，則以在查理十二世時出使土耳其的瑞柯 (Paul Rycaut) 所著《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現狀》(*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Ottoman Empire* 1666) 的紀錄最常被人引用。這些書中對土耳其王位的爭執，近親爭奪權位導致的猜忌與殺害，以及伊斯蘭教徒對基督徒的態度，都有相當負面的描述 (Heywood 40-8)，這也就是洪塞勒斯 (A. J. Hoenselaars) 所稱，英國文學中經常出現被切割的「破碎的形象」(broken images) (157)。

劇本文類中，值得一提的是《阿爾卡薩戰役》，《阿爾卡薩戰役》是文藝復興時期最早同時鄂圖曼土耳其為主題，又以摩爾人為主要角色的劇本之一，這部劇本未受重視，直到運用殖民文學及後殖民主義研究早期文學，蔚為風潮，這本呈現種族問題的劇本才開始受到當代批評家的青睞。這部劇本的全名是《在巴布利阿爾卡薩戰役的悲劇，三位國王及英國上尉斯塔克利陣亡》(*The Tragical Battle of Alcazar in Barbary, with the Death of Three Kings and (of) Captain Stukeley, an Englishman*)，劇本中除誇大伊斯蘭世界的殘暴之外，更渲染英國人的忠誠度。此一由歷史事件改編的劇本以葡萄牙和北非的關係為基礎，核心人物除了葡萄牙國王西巴斯卿之外，還包括最終登上摩洛哥王位的穆力·默罕穆德·塞斯 (Muly Mahamet Seth)、阿爾卡薩戰役中陣亡的摩洛哥國王阿布德麥列克 (Abdelmelec) 及阿布德麥列克的姪兒穆力·默罕穆德·阿爾馬斯路克 (Muly Mahamet al-Maslukh)，但是劇本似乎刻意強調膚色和個性的關連。穆力之母原為北非摩爾人 (Moor)，因此具備所有摩爾人的特徵。為保全王位，請葡萄牙加入戰局，引起摩洛哥內戰，而被劇作家貶抑，戲稱為「摩爾人」，寓意其心機至深。劇本中陳述，戰爭發生的原因是根據當時摩洛哥的法律，王位應先由國王之弟，再由國王的兒子們按照長幼次序繼承。阿布達拉斯 (Muly Abdallahs; Muly Abdallah al-Ghalib) 登上王位後，卻改變舊有的法律，讓自己的兒子穆力·默罕穆德 (Muly) 繼承王位。為了爭奪王位，剛繼位的穆力·默罕穆德涉及謀殺自己的親屬，和原法定的下一個繼承人，即自己的親叔父阿布德穆南 (Abdelmunen)。阿布德曼雷

(Abdelmelec; Abdal- Malek) 不服自己被突然除去繼承權，率眾稱王。王室家族中較為年輕的穆力·默罕穆德·塞斯亦旋即加入阿布德曼雷，對穆力展開圍捕。不料，姪兒穆力·默罕穆德逃往伊比利半島避難，並向葡萄牙國王西巴斯卿 (Sebastian) 請求出兵，而西巴斯卿考慮葡萄牙在北非的商業需求，以及金礦和西班牙相助的勢力，慨然允諾，阿布德曼雷則結合土耳其勢力應戰。劇本的另一著力點是英國天主教忠誠的信徒史特克利 (Stukeley) 上衛，他收到羅馬及愛爾蘭主教格利格萊 (Gregory) 的指令，潛逃至愛爾蘭，計劃謀反當時的伊莉莎白女王。不過史特克利的冒險精神驅使他前往西班牙及葡萄牙，並且受到葡萄牙國王西巴斯卿的重用，加入援助穆力的陣營。此一劇本的結構相當複雜，場景也多所變化。天主教國家和摩爾人的聯合參戰，之後卻因西班牙軍隊更改計劃，而產生變數。劇中，穆力·默罕穆德借葡萄牙的兵力攻打自己的族群，等同出賣自己的國家，摩洛哥又因簽署聯盟，成為鄂圖曼土耳其的附屬國，答應援助「摩爾人」的叔父阿布德曼雷，戰爭情勢因而詭異多變。由西巴斯卿領導的基督徒軍隊最後終於進攻北非的坦吉爾等地，但戰爭的第二天，西巴斯卿陣亡，穆力·默罕穆德落水而死，蘇丹阿布德曼雷在戰爭中病逝，而英國人史特克利則被其領導的義大利軍官殺害。戰役結束後，摩洛哥終於由阿布德曼雷的弟弟穆力·默罕穆德·塞斯繼承王位，結束了跨國戰役，但摩洛哥和葡萄牙兩敗俱傷。劇本與歷史相較，歷史上的阿爾卡薩戰役事實上牽涉更複雜的族群與經濟問題。

根據歷史，十六世紀時的北非摩爾人臣服於鄂圖曼土耳其的蘇萊曼大帝，當時蘇萊曼擁有北非半島的優勢地位，與西班牙競爭在地中海的霸權 (Davis 493-519)。而西班牙的非力普二世，一方面苦於境內的摩爾人與北非的摩爾人秘密連絡，策動謀反，另一方面又得與興起的葡萄牙和荷蘭競爭。阿布德曼雷成為摩洛哥與費茲國的蘇丹之後，他引用鄂圖曼土耳其的軍事策略，在摩洛哥境內，雇用西方外籍人士製造武器。所以，穆力夾著葡萄牙的威風向費茲宣戰的時候，葡萄牙國王西巴斯卿並不知穆力對抗阿布德曼雷的實際原因。然而，當時阿布德曼雷為了應戰，早已秘密地以硝石向英國伊莉莎白女王換取了大量的軍需